

康乾盛世三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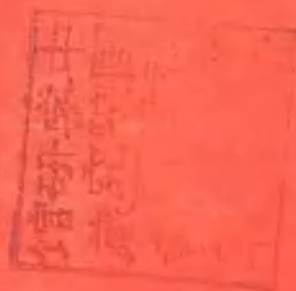
钱宗范 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

康熙盛世三皇帝

钱宗范 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2年·南宁

康乾盛世三皇帝

钱宗范 著

☆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民族大道68)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南宁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18.75印张 插页4 450千字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册

ISBN 7-7435-1615-2/K·13 定价: 8.75元

(桂)新登字05号



康熙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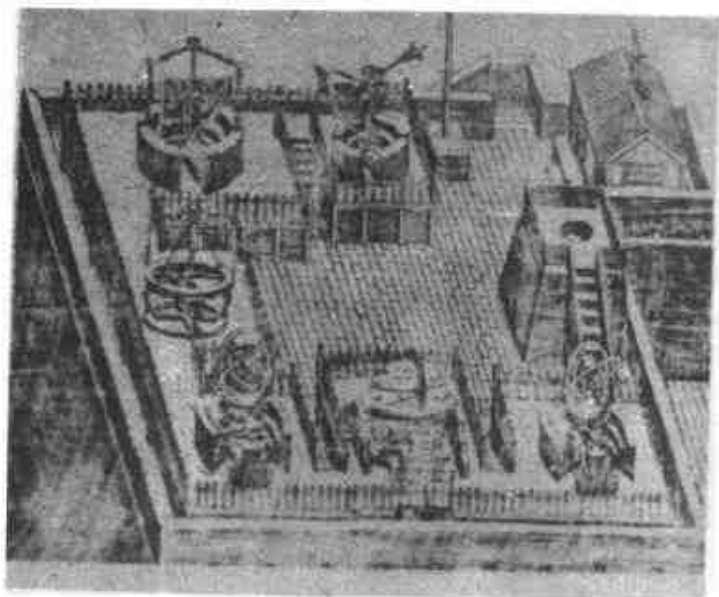


雍正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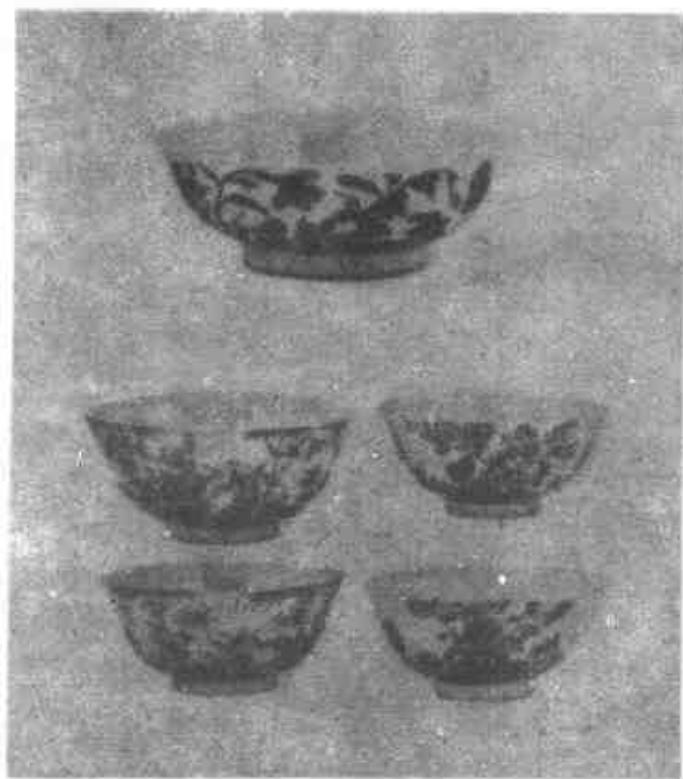


乾隆像





康熙时代制造的天文仪器，其中六件
陈列于今北京古观象台上



康熙时代制造的精美瓷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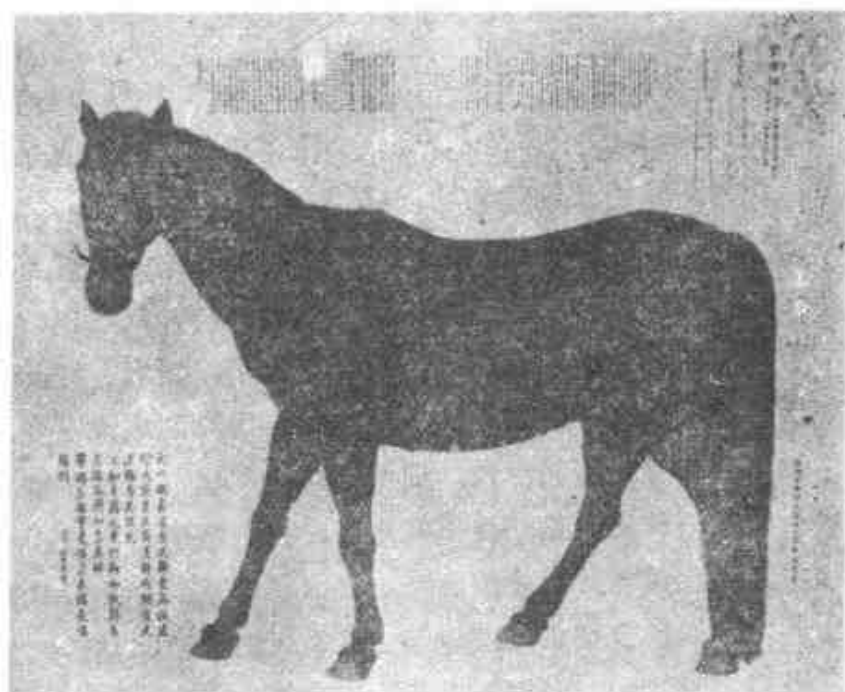
清世宗雍正御用玉玺



清初宫廷画家郎世宁所绘
乾隆大阅图



承德须祿福寿之庙，是乾隆为西藏班禅六世前来朝贺乾隆七十寿辰，仿明扎什伦布寺而兴建的喇嘛庙。



土尔扈特部群王策伯克多尔济进献给乾隆的“宝吉骠”马

前 言

——简说康乾盛世

公元十七世纪六十年代至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约一个半世纪，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相继统治中国的时期，中外史家把这一历史时期称为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的“康乾盛世”，称他们的统治为“康乾之治”。在此以前，中国古代还有“成康之治”、“文景之治”、“元嘉之治”、“贞观之治”等，但这些“之治”最长的不过四十余年，“康乾之治”是其中最后的一个，也是历时最长、在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个。今天，我们学习和研究祖国历史时，对这一些封建盛世特别是对离开今天最近的康乾盛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评价，以批判继承祖国的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康乾盛世，清代以来多数学者都是承认其存在并作了积极评价的，但是，也有一些人否定康乾盛世的存在，其主要说法有二。

其一，认为清代是封建社会，人民群众受到封建制度、封建皇帝、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生活始终是痛苦的，所谓盛世只是对地主阶级、封建皇帝而言，对劳动人民来讲是不存在的。如果讲封建社会有盛世，那就在客观上美化了封建皇帝和地主阶级。

这个观点我们认为值得商榷的。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时期，应从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从当时客观的社会环境出发，而不能现代化，不能超越时代，用对今天时代的要求来要求古代。如果这样做，那末曾经创造过光辉灿烂历史文化的中国古代社会，前后四、五千年的所有时间、所有朝代，都只能是一团漆黑，没有好和坏、进步和落后、光明和黑暗之分了。这当然是不符合史实的。清后期以前的二、三千年中，中国是封建社会。封建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在封建社会中，皇帝的统治，地主阶级和剥削制度的存在，是必然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皇帝和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一定历史时期还起过进步的作用。当时的社会条件只能由皇帝和地主阶级来统治，劳动人民客观上还不具备建立没有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社会条件，谁也不能取消和替代当时皇帝和地主阶级的统治，因为这只能是唯心主义。在古代世界的奴隶社会时期，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伯里克利时代，政治上建立了奴隶主民主政治，经济繁荣，工商业发达，科学文化昌盛，奴隶主国家富裕强盛，是举世公认的古代希腊的盛世。现代资本主义各国在自己的发展中，都经历过兴盛期和衰退期；这是客观的规律。同样在封建社会，不论中国或外国也都有过自己的盛世和乱世。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很长，出现过几个盛世，这是指在封建社会条件下的盛世，指的是这个时代和前一时代比较，国家比较太平和统一，人民群众受到的压迫剥削有所减轻，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比较缓和，社会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政治和文化、思想、科学有较大的进步，人民群众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比前代有了改善，也出现了一批为当时的人民群众所拥护的皇帝和清官，因而这个时期在整个中国历史发展中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这样的时代，就是封建社会的盛世。西周的成康时期、西汉的文景时期、南朝的元嘉时期、唐朝的贞观时期、清朝的康乾时期，就是这样的封建盛世。这是历史的客

观存在。

其二，认为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当时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腐朽没落，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已经落后于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谈不上有封建盛世了。

这个观点我们认为也是值得商榷的。诚然，到了明清时期，西方一些先进国家已经发展了资本主义，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社会制度已发生了重大变革；相对来说，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历史文化的中国，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停滞性，到了明清时期，在生产技术、科学文化知识的发展以及社会制度方面，很多地方已经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事实。但是，应该看到：第一，中国的落后是中国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造成的必然结果，是由中国整个的社会条件，中国整个的国情所决定的，而不是由哪一个朝代的哪几个皇帝的主观意志所能够改变的。所以，把中国落后的原因片面归结到清代统治者身上，而否定清代有过超乎前代的重大进步，有过封建盛世，是不合适的。第二，中国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的转折时期是在明代，不是在清代。十五世纪初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环球航行时间要早，历时要长，规模更大。中国当时航行在大洋上的船舰的规模、制造技术、航海技术还领先于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只是中国是个古老的封建大帝国，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郑和下西洋没有起到促进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作用。到了明代中后期，皇帝昏庸，贪官横行，经济衰败，科技落后，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以至在明末西方传教士利马窦等来到中国时，他带来的西方先进自然科学知识，就比当时中国人掌握的更先进了。第三，清代的社会生产力还在进一步向前发展，而且发展到了我国封建社会史上前所未有的最高水平。史实证明，清代康、雍、乾时期，并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封建制度已经腐朽、没落，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而是比明代的社会更呈现出朝气蓬勃

勃、不断革新、向前发展的精神。当时的中国国势强盛、统一巩固、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清代的耕地面积、农作物的种类和产量均达到封建社会史上的最高水平。清代生产的瓷器、丝绸、茶叶、布匹、纸张以及很多手工艺品的制造技术和产量不仅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的最高水平，而且不少技术达到了当时全世界的最先进水平。可见对清前期的中国社会要作实事求是的分析，既要看到面欧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逐渐赶上或超过了中国，也要看到清代前期的封建社会还在向前发展，还出现过封建盛世。如果我们肯定明代洪武、永乐、宣德年间是明代较好的时期，那末我们更应把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更大的清代康、雍、乾时期称为封建盛世。

康乾盛世，究竟盛在哪里呢？

从政治上来看。

在康熙即位时，国家仍然存在着很多分裂动荡的不安定因素；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国外沙俄侵略者和西方殖民势力又侵略我国领土，威胁我国的安全。巩固国家统一，抗击外国侵略，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实现全国的和平安宁，以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成为历史发展的要求。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康熙、雍正、乾隆顺应了这一历史趋势，采取坚决措施，平定了三藩之乱，消灭了郑氏分裂政权，实现了大陆和台湾的统一，进一步巩固了对南方地区的统一；平定了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罗卜藏丹津、噶尔丹策零、阿睦尔撒纳、大小和卓木、西藏的农奴主分裂主义者、大小金川土司等的叛乱，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在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地区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巩固了对西北、西南地区的统一；击溃了沙俄军队对我黑龙江地区的侵略，和沙俄政府在平等的基础上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布连斯奇条约》、《恰克图条约》，粉碎了西方传教士干涉中国内政的企图，击退了廓尔喀、缅甸等邻国封建政权对我国边

境的侵略，和西南各国建立了和平友好的关系。通过一系列平定国内叛乱、巩固国家统一、反抗外来侵略和干涉的斗争，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版图东到库页岛和台湾，北达外兴安岭和贝加尔湖，西北逾葱岭和巴尔喀什湖，西南达喜马拉雅山南麓，南到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从康熙直到道光后期约近二个世纪中，我国的封建中央政府对这约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的神圣领土一直维持着强有力的统治地位，从而奠定了今天中国版图的基础。这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在康熙以前的我国各个封建王朝，从秦汉以迄宋明，外戚擅权、宦官乱政、藩镇割据、名相主事朝纲、奸相欺君祸国、武将废立国君等等现象，差不多每个朝代都有发生，汉、唐、明三个统一朝代的中后期尤为突出。这些现象成为政治腐败、社会动乱、国家不安宁、剥削压迫加重、人民生活痛苦的根源。清军入关后，把新兴的满族贵族的那种崇尚武功、选贤任能、治政务实的优良政风带入中原，又吸收了汉族王朝历代统治的经验，采取了加强君权的种种积极措施，制订了严禁后妃、外戚、宦官、名相、名将主事朝政的制度，使影响皇帝专权的乱政现象在刚刚萌发的阶段就被铲除，全国权力牢牢地集中在皇帝手里。这些制度在清代前中期实行了二百多年，一直到同治年间慈禧太后破坏为止。明代中后期的君主，多昏庸无能，如正德、嘉靖、万历、天启等皇帝，奢侈荒淫，不理政事，政治黑暗，社会腐败；而清代统一中国后，以焕然一新的面目君临天下，清代的君主中多数人都是勤于政事、治政务实的，其中康、雍、乾尤为突出。康熙、雍正、乾隆在他们治政期间，常常五更起身，晚上秉烛批阅奏折，从连绵几省的战争、上下各级官员的治政，到一地一县的民事案件、蝗灾虫害，事事躬亲过问，作出决断，数十年如一日。为了了解社会情况，康、乾两君又数十次地外出巡视，察访

民俗，指导对黄河海塘的治理，联合和团结各族上层人物，雍正则建立了一套秘密察访和上密折的制度。综观我国上下几千年的古代社会，像康、雍、乾那样勤政务实几十年如一日的英明君主，是很少的。清代既使我国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达到了顶峰，又在综合满族统治习惯和历代汉族统治经验的基础上，使这一制度达到了非常完备的程度，这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在康熙以前，由于明代统治者残酷的压迫、剥削和清初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压迫政策，我国国内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当紧张。康熙、雍正、乾隆对各族上层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团结、联合的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康、雍、乾自己努力学习汉族的传统文化，尊孔重儒，把儒学定为国学，作为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的中心内容。他们尊重汉族的民族习惯，选拔和重用汉族知识分子，大兴科举，举办博学鸿儒、博学鸿词科，鼓励汉族知识分子潜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著书立说，为巩固清政权服务。康熙、雍正、乾隆和蒙古上层贵族建立了世代的联姻亲戚关系，尊崇和提倡蒙藏人民信奉的喇嘛教，大量兴建寺庙，赐给蒙藏贵族和宗教领袖以爵位、财物和自治的权力，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也采取了团结联合的政策。这一系列措施，使得明末清初十分紧张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大为缓和，各族人民和统治者衷心拥护和支持清政府巩固国家统一、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成为平叛和反侵略斗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康雍乾时期我国民族关系的情况，可以说是继唐太宗贞观时期以后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又一次非常良好的时期，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从经济上来看：

在康熙以前的一个时期，我国西临着人口流亡、土地荒芜、经济衰败的处境。康雍乾时期，对明末清初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封建生产关系通过国家机器进行了调整，推行了废除圈地，奖

励垦荒，蠲免赋税，兴修水利，开豁贱籍，“盛世滋生，永不加赋”和“地丁合一”，提高佃户、雇工和奴婢在法律上的地位，取消手工业机户发展的禁令和沿海居民经商的禁令等等措施，减轻了对劳动者的剥削，改善了劳动者的生产条件，从而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康雍乾时期，我国垦荒面积之多，蠲免赋税次数之多和数额之巨，修治黄河、淮河、海塘、永定河等工程时间之长、成效之大，都是以往历史上所未有，对改善劳动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起了积极作用。由于“盛世滋生，永不加赋”和“地丁合一”的推行，废除了两千年以来的人口税，减轻了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的负担，松弛了人身依附关系，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从康熙到乾隆，登记在国家户籍册上的人口数目，从二千多万激增至三亿以上，反映了农民已不再离乡背井而回到土地上安心从事于农业生产，使脱离了生产资料土地的劳动力和失去了劳动力耕种的生产资料土地重新结合了起来，这对发展当时生产力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康雍乾时期采取的这一系列调整生产关系的政策，其贯彻时间之长、措施推行之坚决、成效之显著，在封建社会历史上是少见的。

在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下，康雍乾时期我国的农业生产发展到了新的水平。无论从耕地面积之广、农作物种类之多、产量之丰来讲都超过了过去任何朝代。乾隆三十一年（1766）国家正式记载的垦地数字达到七百四十一万多顷；而且由于没有登记的边远民族地区的草原、山谷、荒漠地带变成为农庄，实际耕地面积远不止此数。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在江浙、湖广、四川的某些地区，上田产量每亩可达五、六石至六、七石。江浙繁富地区生产的大批漕粮，沿着大运河源源北上，国库的粮食贮备始终十分充足。由于粮食的增多和工商业发展的需要，经济发达地区更多地种植了经济作物，桑、茶、棉花、蓝靛、甘蔗、苧麻、烟草、红花等成为重要的商品化的农产品，棉花、烟草的种植从岭南遍

及北方，台湾在统一后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甘蔗生产中心。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达到了封建社会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手工业、商业方面，由于农业的全面发展和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为城镇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原料，康雍乾时期我国的手工业生产达到全盛局面。我国的丝织、棉织、麻织、瓷器、铸铁、制糖、制茶、造纸、采矿、木材、制革业以及竹、木、石、玉、金、铜、编织、工艺品等等的制造技术和生产量都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高峰。有的技术如瓷器、丝织、棉织业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遍及全国的家庭手工业更加发达。在江南的苏州、江宁（南京）等大纺织业中心，产生了大包买商，拥有雄厚的资本、原料和织机，直接雇佣工人或机户进行生产，成为大包买商兼大手工业主，在各地的丝织、棉织、麻织、造纸、铸铁、制糖、瓷器、采矿、木材等部门中，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作坊和工场普遍增多，商业进一步繁荣起来。北方的陆路商队频繁地从北京运货去东北、蒙古、青海、新疆、西藏，大运河、长江、珠江等河流中商船往来络绎不绝，北京、苏州、佛山、汉口、江宁、扬州、杭州、广州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大批工商业城镇在江南地区崛起。民族地区的工商业城市迅速发展，农村的墟市更加兴旺，我国的对外贸易也发展起来，茶叶、蚕丝、绸缎、瓷器、棉花、铁锅、中药、各种手工艺品大量输出国外，而从国外进口数量极少的棉花、毛织品、香料、奢侈品，在对外贸易中保持着大量的出超地位。通过对外贸易，大量的白银流入我国，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收入。这反映了当时我国总的经济实力优越于和我国进行和平贸易的俄国、英国、法国、荷兰等西方国家。

在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基础上，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越益富裕。康熙年间，封建国家每年收入银子从三千万两增至五千万两，到了乾隆中期增至七千多万两。尽管治理黄河、兴修海

塘、战争开支、赈济蠲免等每年化去大量银子，而国库存银不见减少，而是不断增加。康熙、雍正、乾隆提出了“藏富于民”的思想，认识到只有让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富裕，他们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才会增加，生产和经营的条件就会改善，生产和经营活动就会发展，国家的收入就会增多的道理。当时国库的富裕，财力的雄厚，以及统治者“藏富于民”思想的提出，正是封建社会处于盛世的写照。

从科学文化上来看，

康雍乾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学术文化兴盛，人才辈出的时期。无论在对中国传统的国学经、史、子、集的研究，还是在对天文、历法、地理、医学、物理、化学、数学、生物等自然科学的探讨，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康乾时期，编纂出版了我国现存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编纂了我国最大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整理、编纂、著述、出版了难以数计的大量的学术著作和图书资料，这是过去任何朝代也比不上的。今天我们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离不开阅读和参考清人的著述；今天我国图书馆中所藏的线装书，大多数都是清代官私书坊编纂出版的。由于当时政府提倡和鼓励知识分子少问政治，钻研学术，减少了政治对学术的干扰；提倡和鼓励各种官私学术著述的出版，通过科举和各种特科，选拔学而优的人才参政，也有利于学术的发展。康乾时期，是我国古代学术界群星灿烂的时期，涌现出了如王锡阐、梅文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阎若璩、万斯同、方苞、惠栋、全祖望、钱大昕、王鸣盛、赵翼、戴震、纪昀、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梁玉绳、顾栋高、姚鼐、孙星衍、叶天士、徐大椿、明安图、王贞仪、陈潢、杨岫、唐英、蒲松龄、曹雪芹等著名学者，他们在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领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著述成为我国历史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康乾时代学术文化之盛，在我国封建社会史上，是少

见的。

从领导这个封建大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康熙、雍正、乾隆的治政方面看。康雍乾三君的治政和过去各代皇帝比较，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他们都是既具有雄才大略、远见卓识的治政才能，又具有勤于政事、治政务实的治政精神，这是前代君主很少能同时具备的。第二，他们既集国家大权于一身，事无巨细躬亲决断，又能通过种种手段了解下情，从而使得他们对国家大小政事的决断做得比较正确，取得了较大的成效，这也是极为可贵的。第三，他们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也是杰出的学问家。康熙堪称是我国所有封建君主中最懂得科学、最热爱科学、最提倡科学的君主；乾隆在自然科学方面不及乃祖，但他酷爱中国的国学，其诗文书画俱佳，甚至超过了和他同时代的汉族学者；雍正的诗文字亦好，他每天批阅大量奏章，有时一批千百字，反映了他的知识和文字水平。这也是前代的君主很难比得上的。康、雍、乾三君主有这样几个前代君主及不上的优点，是保证了他们治理下的时代出现盛世的重要原因。

当然，康乾盛世是封建社会条件下的盛世，同样存在着任何封建时代都存在的剥削制度、阶级对立和种种矛盾。康熙皇帝，这位孜孜不倦工作了一生的著名君主，在他的晚年治政也流于疏阔；以勤政和改革著称的雍正帝，却崇信佛教道教，残忍地迫害他的政敌，为历来史家所非议；多才多艺的风流天子乾隆帝，晚年为他的“十全老人”、“古稀天子”所陶醉，生活铺张奢侈，官场中贪污腐败之风滋长；康雍乾三君主都搞过文字狱，迫害过一部分无辜的知识分子。我们提到这一些，是要说明康雍乾是封建时代的君主，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可能超越他们时代和阶级的限制。但是，康雍乾的这些缺陷，和他们的政绩，和他们对中国历史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来比，是很不足道的。

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